

## 「隱秘的顛覆」：

## 「文化置位」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 ——李立三與安源工人運動析論

■ 胡可濤

中國礦業大學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李立三（1899-1967）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物之一。1920年12月，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委派，二十出頭的李立三來到安源組織工人運動。在臨行前，毛澤東叮囑其利用一切合法的條件爭取公開的活動，並和工人群眾接近，發展黨、團員。李立三遵照這一要求，在安源積極地開展工人運動，截止到1923年4月下旬他出任中共武漢區執委會委員長為止，在近一年的時間裡，他創辦了安源工人俱樂部和工人消費合作社，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安源的黨、團組織，為後來的安源工人運動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即使在1923年「二·七」大罷工的失敗，中國工人運動走向低潮，安源工人俱樂部依然維繫到1925年9月。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稱：「在此消沉期中，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真為『碩果僅存』」，安源煤礦是工人運動的「世外桃源」<sup>[1]</sup>。

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認為：「大多數共產黨的早期領導者，包括毛澤東在內，都是受過教育的讀書人，他們在進行組織工作活動中，運用了重要的文化資本和創新力。我認為動員過程的核心是『文化置位』(Culture Positioning)——或者說，對一系列符號資源（如宗教、儀式、修辭、服飾、戲劇、藝術等等）的戰略性運用在政治說服中所發揮的作用。」<sup>[2]</sup>裴教授的觀察無疑是細膩而精準的，這一結論用來分析李立三在安源工人運動中的表現無疑也是適用的。本文在此基礎上，將研究視野拓寬，在傳統文化現代轉型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雙重視角映射下，分析李立三成功開展安源工人運動的奧秘之所在。

## 一、「內聖」與「外王」的現代轉型

傳統的知識份子，在價值導向方面基本上按照《大學》提出的「三綱領」、「八條目」的方向，從

**摘要：**作為新式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以往的「內聖外王」架構顯然已經無法解釋李立三的行為模式。不過，傳統的力量不僅沒有成為李立三開展工人運動的包袱，相反，李立三在安源進行的「文化置位」工作，其實質是將馬克思主義植根於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土壤中。他不僅巧妙地利用「傳統」來「反傳統」，還大膽借鑒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來反對資本主義。這種務實而靈活的態度，成功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安源扎根，並最終通過「運動工人」走向「工人運動」。

**關鍵詞：**李立三；文化置位；安源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內聖」走向「外王」。易言之，在正統儒家看來，一個人首先需要修身，學會做人，這相當於完成了「修己」的工作。然而，光有「內聖」是不夠的。還需要走向「外王」（「齊家」、「治國」、「平天下」），去實現「安人」或「安百姓」的任務。可見，「內聖」是「外王」的邏輯前提和實踐基礎，「外王」是「內聖」的昇華與發展。在傳統社會中，政治領域出現的察舉制、科舉制等選拔人才制度為「內聖外王」提供了現實的保障。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個知識份子都能進入仕途，實現「學而優則仕」。不過，正如荀子所說：「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sup>[5]</sup>知識份子在現實中，不管生存境遇如何，其社會關切是自始至終的。這一點，從傳統到現代並沒有太大改變。李立三生於1899年，他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帶有相當強烈的傳統色彩。其父李昌圭，作為一名秀才出身的私塾先生，很早就有意識地以儒家式的教育開展對李立三的培养。在此影響下，李立三的國學功底相當扎實，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其父。他不僅熟讀基本的典籍和傳統的文學經典，而且還掌握了創作古體詩、詞、歌、賦以及對聯等才藝。後來，李立三曾將其年輕時期所寫的詩、詞編輯成《芋園詩草》一書，可見其傳統國學的功力著實不弱。或可說，如果沒有早期良好的傳統教育以及對傳統文化以及基層社會的深入理解，李立三在20年代初期很難順利打入當時傳統力量和思維慣性還很強大的安源開展工人運動。

從儒家「內聖」方面來看，現有的資料很少有李立三如何加強個人道德修養的記載，倒更多地呈現其行為不合常軌，與傳統價值觀格格不入的一面。姚文奇先生的《李立三與父親的恩恩怨怨》一文，詳細記載了李立三與其父李昌圭之間的價值觀念衝突的事例<sup>[6]</sup>。其父對他愛之甚深，責之亦切，李立三一度被指責為「逆子」、「籠不住的野馬」。青少年時期的李立三屬於一種典型的叛逆性人格，他在「傳統」的薰陶下成長，「傳統」卻被他視為束縛自我的「牢籠」。尤其是伴隨著他獨立人格的養成，與其父價值觀念的衝突日益尖銳，最終驅使他逃離舊式家庭，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的道路。以舊道德的標準看，他忤逆父意，是為不孝；辛亥革命，帶頭剪辮，是為不忠；拋妻離子搞

革命，是為不義。從李立三的成长軌跡來看，他似乎並沒有完成傳統意義上的「內聖」工作。

馬克斯·韋伯曾把權威分成三種類型，即傳統型、理性型和魅力型。所謂魅力型(Charisma)權威往往強調個人憑藉超凡的才能，或者傑出的品格、或者英雄主義對群眾產生天然的感染力和影響力和說服力。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注意到這種魅力型人格典範在開展革命運動中所發揮的功用。所以，他很注意自己打造自己的「神聖魅力」。當然，這種人格在李立三身上不是靠道德的優異來凸顯，而是靠自我獨特性的塑造以及利用群眾迷信心理配合達成的。抵達安源之後，李立三或是身穿長衫，或是西裝革履，總能以時髦的打扮吸引別人的目光。根據一位安源工人的回憶：「當時，敵人揚言要捉拿和暗殺工人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工人傳神地說：『李主任有五國洋人保護，刀槍不入。』因為他是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平時穿長大褂，胸前佩戴著一些金屬的徽章，顯得非常精神。傳說他『刀槍不入』，這表達了工人們對自己領導者的愛戴。」<sup>[7]</sup>「刀槍不入」當然是無稽之談，但李立三卻從不闢謠。這種「神聖魅力」為他贏得了洪幫的支持和廣大工人群眾的擁護，即使是各種保守勢力，對他也有所忌憚，客觀上為開展工人運動提供了便利：「李立三所運用的文化置位方式，將舊有的與新穎的內容進行融合，把刀槍不入形象的觀念以及師徒關係這些人脈普遍擁有的認識，進一步發揮，譬如他創造性地宣稱獲得了來自海外的力量。他形成的這種領導模式相當有吸引力，效果顯著。」<sup>[8]</sup>

按照傳統儒家思想的邏輯，如果李立三缺乏傳統式的從「格物」、「致知」到「正心」、「誠意」的修養工夫的話，那麼，他的「外王」工夫勢必無法安置。然而，在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中華民族日趨深重的內憂外患讓「外王」變得極其迫切，而以往修身養性的舊道德很快在五四運動期間被「科學」和「民主」的口號所壓倒。不僅「內聖」不再必然成為「外王」的前提和基礎，相反卻成為障礙與包袱。而且，傳統模式下的「外王」本身亦於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而失去現實的根基。如此，傳統的「內聖外王」模式注定是失效的。不

過，「內聖外王」所蘊藏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sup>[7]</sup>的「仁道」精神卻能夠繼續延續。它在中國近代以來遭遇的屈辱歷程中，轉化為知識份子「救亡圖存」的內在驅動力量。「外王」之信念愈執著，變革社會之衝動欲強烈，實踐之效果愈明顯，則愈能凸顯知識份子的「內聖」。此時的「內聖」重點不在德性，而在於能力（德性甚至被包含其中）；不在做人，而在做事。或可說，傳統意義上的「內聖」在現代意義上只是作為一種「私德」而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但是「外王」式的「公德」卻成為個人評判的最終依據。正如嚴搏非先生所說：「在近代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危局』而要求變通思想以自強保種的時候，中國知識份子就只有放棄『內聖』的道路，甚至懷疑和批判『內聖』的道路，直接為『外王』尋找新的方法和武器了。」<sup>[8]</sup>安源時期的李立三無疑符合這個特徵。他的「新外王」事業已經不再依賴傳統的儒家思想來支撐，而是在傳統的遮蓋之下，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真理，來開展「新外王」的事業。

## 二、「文化置位」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1921年歲末，李立三被派遣到安源路礦開展工人運動。此前的幾個月他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他畢生的信仰。他過去未必是儒家的信徒，此時更不是儒家的信徒。但是，他非常了解受傳統儒家影響甚深的中國傳統社會。雖然在1912年，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已經被推翻。不過，根深蒂固的傳統思維習慣和盤根錯節的社會守舊力量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安源路礦本身是洋務運動的產物，是盛宣懷領銜創辦的官督商辦企業，這其中不僅有官僚買辦的力量，而且還和帝國主義、秘密幫會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李立三在安源開展工人運動，成功地完成了裴宜理所說的「文化置位」的工作，即利用中國傳統的文化元素，並在「傳統」的掩蓋下，悄然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和開展工人運動。大體而言，他主要從四個方面入手，進行「文化置位」的工作。

首先，借助傳統的人際網路，建立工人運動的統一戰線。中國傳統社會講究愛有差等，親疏

有別，由此造成了對人、對事的特殊性。因為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就不得不「托關係」、「講人情」。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的提法，中國社會是一種「熟人社會」。說白了，就是因為熟人好辦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人們利用血緣、鄉緣、學緣、志緣等拉近距離，形成某種意義上的「小圈子」：「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人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關係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路，因之，我們傳統社會裡所有的道德也在私人群系中發生意義。」<sup>[9]</sup>李立三並非一個死讀書的「書呆子」，從他到安源一年多的經歷來看，他特別擅長運作人際關係，並且利用這種傳統的人際關係為開展工人運動提供便利：「在中國共產黨史上，安源罷工被描繪成一個純粹的無產階級英勇事蹟的光輝典型。而實際的情況其實要更為複雜。知識份子、地方士紳、軍官、洪幫龍頭老大以及教會牧師俱為這次罷工勝利有所貢獻。」<sup>[10]</sup>

在進入安源前夕，李立三懇請湖南省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副董事長李六如為他手書一封情詞懇切的推薦信，然後再通過他靠他父親的好友，安源商會的謝嵐舫轉呈給安源所在地的萍鄉縣知事。通過一重又一重的熟人關係，讓他獲得了信任。這是李立三進入安源第一次公關的成功。由於他獲得了萍鄉當地官員的信賴和撐腰，這就為他在安源開展工作提供了「保護傘」。到了安源之後，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廣交朋友，為安源工人運動的成功壘砌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他通過開展平民教育，借助於師生關係來拉近與工人的距離，並且逐步加強他在工人運動中的權威地位。1921年12月下旬，李立三創辦安源平民小學。該學校由於不收學費吸引了工人及其子弟的注意。一開始就招收到三十四名學生。他白天給學生上課，晚上則利用自己教師的身份，穿著傳統舊式的長衫，挨個進行家訪，深入地接觸和了解工人，由此博得了「遊學先生」的雅號。在贏得工人尊重的同時，李立三又注意拉近與工人的距離，他甚至讓工人稱呼他為「老李」。事實上那時他才二十出頭。

李立三號召成立下的安源俱樂部近乎打著傳統儒家思想的旗幟，宣稱「聯絡感情、涵養德性、



團結互助、共謀幸福」，由此獲得地方官紳的支持。此外，他還利用地緣、學緣等傳統的人際網路來推動工人運動的開展。例如，他創立的安源工人俱樂部使用的是湖北同鄉會會館。在安源的工人群體當中，洪幫的勢力和影響較大。洪幫的龍頭老大是礦上的顧問，包工頭大多是他的徒弟。這種師生關係與工人運動中領導與被領導者雙重身份的疊加客觀上加強了李立三的「領袖魅力」。李立三首先成功地吸收了少數洪幫小頭目入黨，然後通過小頭目結交洪幫龍頭老大。據他本人回憶說：「洪幫頭子見我去很高興，稱我為李主任，喝完雞血後，我說我們要罷工，又講了一些罷工是為窮兄弟謀幸福，保護窮人等道理，提出要他講義氣，多幫忙。他爽快答應，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甚至一些資本家和知識份子也認為俱樂部了不起。」<sup>[1]</sup>在他的努力下，不久，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支部成立。到了1922年1月，安源工人補習學校開辦，直接招收工人接受教育與學習。僅僅一個月後，中共安源黨支部成立。

其次，利用傳統的社會心理進行理論宣傳與動員。「崇文重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不論是普通官員，還是平常百姓，常常把發展教育當成頭等大事。李立三巧妙地利用這一群眾心理。他根據當地官員期望發展當地教育的初衷，以懷有熱切抱負的青年教師身份進入安源。並且，他了解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之下，守舊官員一般不願意改變，對白話文運動有著強烈的反感心理。他運用早年扎實的國學功底，寫就了一篇辭藻華麗的「四六」駢體文，聲明開辦平民學校的目的在於：「學習文化，增長知識，改良習慣，涵養德性」，這一口號又明顯帶有了儒家士大夫「經世濟民」的道德意圖。自然深受萍鄉縣知事的青睞，批復李的行為「有利地方，符合要求」。那時的安源充斥著妓院、賭場和煙館。這個人口八萬的小鎮僅有一所基督教會創辦的學校。這所學校高昂的學費讓絕大部分家庭望而卻步，而這所學校教學內容的基督教色彩顯然不為受儒家「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sup>[2]</sup>觀念影響的傳統士人所喜。對於洋人創辦教堂、學校，縣知事是出於無奈，從李立三身上，他似乎找到了與洋人對抗的力

量。李立三創辦的平民學校在五福巷張紫民家，採取複式教學，工人子女免費入學。李立三不止一次運用儒家的價值理念，強調興辦教育對於當地移風易俗的重要性，以此獲得當地以及外地社會精英人士的募集資金。平民夜校的經費來源於長沙和上海的一些熱心平民教育的人士募集而來。他創辦的平民學校類似於傳統的「義學」，由於不收學費，再加上官方文告的合法性保障，使其立即獲得了工人們的青睞。學校開辦後，李立三白天給工人子弟上課，晚上則成為工人夜校的課堂，在教授基本文化知識的同時，悄然地傳播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思想。

在傳統中國，由於教育普及水準的低下以及封建迷信的盛行，中國社會的下層民眾或多或少受到迷信心理的影響，並且這種影響往往與一些民間宗教摻雜在一起。如李氏在拜訪洪幫老大時，已被吸收入黨的洪幫成員周懷德和西從乃替他鼓吹，說「李先生全中國各大城市口岸都走遍了，不光跑過江湖，還漂洋過海，參拜過馬鬍子（馬克思）和恩鬍子（恩格斯），身受兩位菩薩的保護。」還說：「若與李氏結交，定會時來運轉。」包括李立三被傳說具有「刀槍不入」的能力，顯然還是群眾迷信心理的作用，但是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當地軍隊的士兵亦聽說過李立三刀槍不入的傳言，當安源工人運動爆發後，他們甚至並未干預和鎮壓工人的罷工運動。

再次，吸收傳統的社會組織、儀式經驗，創辦和發展工人組織。安源路礦在創辦始，就逐漸有幫會力量的滲透。工人交納一定的費用加入，幫會則給工人提供保護。作為一種秘密社會，洪幫組織甚為嚴密而且隱秘，在組織上強調對龍頭老大的擁戴，加入洪幫需要宣誓，在思想觀念上強調「江湖義氣」，幫會成員接頭則有「隱語」。李立三深受啟發，他不僅與洪幫龍頭結交，還高度模仿洪幫的組織運作方式，將安源路礦每個車間十個人組成一個十人團，並有各自的隱語暗號。而且俱樂部需要交納會費，加入同樣則需要宣誓。1922年5月1日，安源工人俱樂部成立的遊行活動中，他們將馬克思的半身神像作為新神加以供奉。顯然，在傳統儀式中的神靈崇拜被李立三悄然地置換為對馬克

思的尊崇。對於工人而言，馬克思宛如「上帝」照臨人間，李立三則是「聖子」耶穌。馬克思主義理所當然就成為激發工人鬥志，庇護工人組織的「聖靈」了。一個筆名「紹予」的作者以讚譽的口氣說：「安源二萬工人的團體，所以能夠成立幾年而日有進步，就是因為他們已培養成一種牢不可破的紀律的原故。例如他們對任何問題都能絕對的少數服從多數。凡是代表會議通過的議案都是絕對的有效，至於擁護領袖，擁護團體的精神，簡直是人人都是很充分的。」<sup>[13]</sup>

最後，利用傳統的文化符號加強工人的政治認同。李立三非常擅長對工人的教育和宣傳，他不僅通過平民夜校的課程來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而且他竭盡全力對工人進行啟蒙，讓他們認識到自身苦難的根源。根據記載「當此憂患迭至之時，安礦積弊已深，惡習不減，上下勾結，惟事貪污。窿內十八段段長，至稱為八路諸侯，即低級工頭每月亦可收入千數百元，工人則備受剝削，生活艱苦。」<sup>[14]</sup>李立三一方面無情地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另一方面則儘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來闡明工人階級的地位以及團結的重要性。譬如他巧妙地利用中國傳統的拆字重組法，給工人鼓勁：「有的工友說：工字不出頭，工人沒身翻；生字有出頭，生意翻滾翻。這話不對！大家看，『工』字上面一橫是天，下面一橫是地，中間一豎就是我們工人，工人頂天立地，怎麼說不出頭呢？大家再看，『工』字與『人』字結合，不就是一個『天』字嗎？一個人兩手擎青天，我看，工人將來是要坐天下的！別說翻個身，就是上天攬月，下海擒龍，我們也做得到。問題是大家要團結，要齊心。」<sup>[15]</sup>他在教工人認識「牛」字的時候，在下面加一橫，說是「先生」的「生」字。他說：「『先生』也不過是牛坐板凳。那些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先生』並不高明。」<sup>[16]</sup>「折筷子」的故事很早就在中國流傳，而且有很多版本。不過大體情節接近，都是講一根筷子容易折斷，很多根筷子就不容易折斷，以此說明團結合作的重要性。這個故事也被李立三借用以說明工人階級大團結的重要性。根據昔日安源路礦工人的回憶：「有一次，李立三同志講工人只有團結起來和資本家進行鬥爭才有力量

時，拿來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作示範。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了，一把筷子捆在一起就不容易折斷。這個簡單的道理發人深省。」<sup>[17]</sup>李立三極富才情，他還仿照當時舊學堂樂歌《十八省地理歷史》的曲調，重新填詞，編出了一首後來在工農群眾和紅軍戰士中廣為傳唱的《工農聯盟歌》，歌詞曰：「我們工農創造世界人類衣食住，不做工的資產階級反把我們欺。起來，起來，齊心努力鞏固我團體，努力奮鬥，最後勝利定是工農的。」<sup>[18]</sup>

在吸收和利用各種傳統文化元素的基礎之上，李立三竭盡所能地展開對工人的教育和宣傳，極大地提升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識，加強了他們對工人運動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認同。李立三的成功也引起了一些守舊和反動勢力的警惕。當時一位筆名為「石」的作者表示極度地震驚和恐懼，他說：「迄自黨魁李隆郅等前往安源，組織工人俱樂部後，把那些組織的常識，都輸入了。從前不說話的人，公然能在大會場中說起話，演講起來！並且，這些人都無形受李隆郅指揮，做了工人的領袖，能領導工人一致行動，這是共黨在安源的教育宣傳工作第一步的成功。」<sup>[19]</sup>

### 三、「傳統」掩蓋下的「反傳統」

李立三在安源進行的「文化置位」工作，其實質是將馬克思主義植根於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土壤中。然而，馬克思主義畢竟是一套革命色彩比較濃厚的理論與學說，它與傳統相決裂是必然的。在「文化置位」工作中，李立三所做的是竭力與傳統妥協和合作，甚至是利用傳統作掩護，來秘密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夯實工人運動的根基。而一旦當工人階級的力量在馬克思主義的凝聚之下足夠強大的時候，工人階級對待傳統勢力乃至階級敵人便不再妥協和退讓了。雖然安源工人俱樂部與傳統勢力的衝突在李立三離開安源之後變得更加明顯，但是安源工人階級的組織和隊伍建設的成功確實成為其得以存續的重要保障。正如鄧中夏的觀察：「工會仍舊巍然獨居，本來二七慘案後，安源路礦局接北京交通部來電，囑其封閉工會，但路礦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勢力集中，產業又極重要，工人組織力與戰鬥力亦相當豐



富，若封閉工會，無疑的必然遭到工人決死的反抗，於礦山生存實在有重大危險。路礦局方面深明於此，故不敢遽爾壓迫，而工會方面亦極十分注意防範，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潰。」<sup>[20]</sup>顯然，這與李立三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若說「文化置位」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與傳統的融合的話，那麼，在「文化置位」的工作完成之後，工人階級的力量足夠強大之後，馬克思主義「反傳統」的特徵就變得趨於明顯了。

李立三在安源開展工人運動，一開始依靠的是傳統的地方社會精英以及秘密社會，他贏得了他們的支持，故而得以順利地開展工人運動。然而，當工人階級的力量足夠強大，那麼，對他們的態度不再會是妥協，而是獨立自主，頑強地開展與路礦當局的鬥爭。在安源工人俱樂部發起大罷工後不久，李立三特意拜訪洪幫和紳、商、學界首領，成功地贏得了他們對罷工的同情和支持。到了9月16日上午，紳、商、學界首領紛紛致函工人俱樂部，希望工人首先讓步，然後再與資方商討條件。此時，在李立三和劉少奇主導下的安源俱樂部明確表示，當局不承認條件即無說話餘地。至於與工人群體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洪幫勢力，李立三在安源罷工前夕帶著幾瓶好酒、一隻公雞及其他禮品，親自拜訪洪幫龍頭，並讓其協助罷工運動的開展，具體要求有三：一則不出現賭博；二、關閉鴉片館；三、罷工期間不發生案件。洪幫也確實頗有「江湖義氣」，履行了承諾。若干年後，李立三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透露了他內心的真實想法：「罷工勝利後，資本家想以洪幫為藉口破壞俱樂部，我送他（洪幫龍頭）些路費，把他送走。工人運動興起後，洪幫就瓦解了，不瓦解，工人組織是不會很好建立起來。」<sup>[21]</sup>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李立三為了將馬克思主義植根於中國傳統的社會土壤，不僅僅利用中國傳統的元素，實際上還吸納了其他文化元素，包括資本主義的文化及制度的合理元素。1922年7月，李立三在安源工人補習學校內開辦第一個工人商店—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兼任總經理。該合作社以「可買便宜貨」為口號向群眾宣傳。通常，加入合作社的工人可購買廉價商品，未

加入的則以市場價購買。合作社還大膽創新，採取了股份制形式融資，認股若干，至少一股，最多十四股，共集資萬餘元。並在新街增設第一分社，擴大規模。根據時人的描述：「去年（一九二二年）七月合作社得告成立。當時股本僅一百元；社員，三十餘人，營業於俱樂部內，設店販賣最少數的布匹和日用品」<sup>[22]</sup>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之後，一萬三千多名工人全部加入合作社，股金增加至2萬元。其中，12000元為俱樂部基金，8000元為社員的股款。每股5角，月息七厘，每個社員至少購買1股，最多購買14股。在分紅方面，十分之三分配給各股東，十分之三留作俱樂部基金，十分之三為消費合作社的基金，十分之一則用於招聘的營業員的薪金。值得一提的是，俱樂部還發行了中國第一張紅色股票。事實上，股份制產生於18世紀的歐洲，19世紀後半期開始流行於世界各國，包括清政府時期的洋務派創辦的企業之中。李立三大膽地借鑒了這一明顯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經濟模式，創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紅色股份制經濟實體。當然，這一股份制的運作目的重點不在於發展資本主義，而是對付資本主義、抗衡資本家的剝削。

雖然，李立三在《敬告安源工友》一文中謙虛地說：「俱樂部就是萬餘工友精神和力量的結晶體，決不是一個人創造出來的。」<sup>[23]</sup>但是，沒有他這種「但開風氣不為先」的精神，安源工人運動很難發展如此蓬勃。他不僅巧妙地利用「傳統」來「反傳統」，還大膽借鑒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來反對資本主義。這種務實而靈活的態度，成功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安源扎根，並最終通過「運動工人」走向「工人運動」。李立三在安源的政治實踐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必須進行「文化置位」的工作才能扎根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之上。馬克思主義唯有「中國化」，才能夠更好地「化中國」。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上半期非中共知識群體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與接受研究。  
(項目號：16YJC710014)

<sup>[1]</sup>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天津：知識書

店，1949年），第92頁。

- [2] 裴宜理，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頁。
- [3] 《荀子·儒效》。
- [4] 詳見姚文奇：〈李立三與父親的恩恩怨怨〉，載《湖南文史》，2002年第4期，第41-44頁。
- [5] 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撰委員會：《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939頁。
- [6] 同注[2]，第60頁。
- [7] 《論語·雍也》。
- [8] 嚴搏非：〈論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科學主義思潮〉，載許紀霖編選：《現代中國思想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9頁。
- [9]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40頁。
- [10] 同注[2]，第61頁。
- [11] 同注[5]，第904頁。
- [12] 《孟子·滕文公下》。
- [13] 紹予：〈安源路礦工人之偉大組織〉，載《中國青年》，1924年第18期，第8頁。
- [14] 江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編：《萍鄉安源煤礦調查報告》，（南昌：江西省政府統計室，1935年），第16頁。
- [15] 郭晨、劉傳政：《李立三》（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年），第47-48頁。
- [16] 唐純良：《李立三全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頁。
- [17] 同注[5]，第936頁。
- [18] 轉引自郭晨、劉傳政：《李立三》，（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年），第112頁。

[19] 長沙市革命紀念辦公室、安源煤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71頁。

[20] 同注[1]。

[21] 同注[5]，第900頁。

[22] 〈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的沿革和現狀〉，載《平民》，1923年第155期。

[23] 同注[5]，第90頁。

**“Covert Subvers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under “Cultural Positioning”  
-- Analysis of Li Lisan and Anyuan’s Workers’ Movement**

HU Ke-tao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leader of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Li Lisan successfully used the “cultural position”,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Anyuan workers’ movement. As a new type of intellectual, li Lisan’s behavior pattern could not be explained by the previous framework of “internal sage and external king”. However, the power of tradition did not become a burden for Li Lisan to carry out the workers’ movement. On the contrary, the essence of Li Lisan’s work of “cultural positioning” in Anyuan was rooted Marxism in the soi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He not only deftly used “tradition” to “oppose tradition”, but also boldly drew lessons from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to oppose capitalism. This pragmatic and flexible attitude successfully promoted Marxism to take root in Anyuan, and finally moved to “workers’ movement” through “movement workers”.

**Key Words:** Li Lisan, Cultural Positioning, Anyuan Workers’ Movement, Sinicization of Marxism